

# 劉再復的人生與文學

## ——從《走向人生深處》說起

● 申霞艷

近些年，劉再復以「紅樓夢悟」、「雙典批判」、「漂流系列」等作品表現出「回歸」中國文化的傾向。這種回歸是經過內心一系列中、西撞擊之後的「回歸」，是一種超越性回歸。



劉再復、吳小攀：《走向人生深處》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1980年代，劉再復的文學論著與李澤厚的美學著作曾是剛從封閉禁錮中艱難走出來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必讀書目。基於李澤厚所解

釋的康德 (Immanuel Kant) 主體性理論，劉再復提出了「性格二重組合論」和「文學主體性」等命題，在中國文學評論史乃至當代中國文化史上，產生開創性的影響。

1989年之後，劉再復長居美國，並往來於歐、美、日、韓及港台地區，親身體驗多種文化的「衝撞」。在一種前所未有的漂流不定的生涯裏，他從未放棄對文學進行思考和對既有理論體系的完善工作，並且產生了相當多的感悟性札記式創作，這些感性與理性交織的文字，不僅頗具文學和思想價值，也有文體創新的意義。在不斷地推出新著的同時，劉再復將自己的視野投向更廣闊的社會文化批判領域，並對中國古典文化的近代道路進行了深入的反思。他與李澤厚共同完成的《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sup>①</sup>一書在海內外激起千層浪，由此引發的「改良與革命之爭」迄今未休，關於歷史價值的重大的討論也將持續產生影響。

近些年，劉再復以「紅樓夢悟」、「雙典批判」、「漂流系列」等作品表現出「回歸」中國文化的傾向。這種回歸不是徐志摩對康橋的「輕輕的」去和來，而是目睹了真實的「西方」——經過內心一系列中、西撞擊之後的「回歸」，是一種超越性回歸。

由《羊城晚報·花地》記者吳小攀採訪撰寫的《走向人生深處》(引用只註頁碼)一書，是一部時間跨度長、空間跨度大、堪稱「全球化」的訪談錄，是作者與一位在人生、學術、思想等層面螺旋式上升的複雜人物的深度對話。吳與劉再復的第一次面談是在2002年的香港，此後「各奔東西(半球)」，又多次見面、通信、通話，這些訪談內容最終於2011年匯聚成書，由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這本訪談錄經歷了「八年抗戰」<sup>②</sup>，期間碰撞出多少思想的火花可想而知。訪談錄不同於報刊的一次性採訪，它既保留了一定的現場感，也留下了八年時光流淌的印痕；所提問題既體現了資深文化記者的開闊視野與敏銳觀察，也反映出一位普通青年對文學的理解與關懷。劉再復在這個漫長的訪談過程中細細梳理了自己的人生，並在深思熟慮的基礎上，展示了自己的文學觀、思想觀、人生觀，其中蘊含着一種誠實的心靈詰問。這種自我詰問有賴於非常「邊緣化」的處境，也有賴於「走向人生深處」。在國內喧鬧的環境中，有幾人能耐住寂寞獨坐書齋，更遑論「三省吾身」？

與這部訪談錄一起，中信出版社還出版(或再版)了《罪與文學》、

《傳統與中國人》、《人文十三步》等八本劉再復的著作(含合著)，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呈現了他的學術與創作成果。孟子有言「知人論世」，這部訪談錄是全面了解劉再復心路歷程的索引，是步入其思想堂奧的階梯。

## 一 「第二人生」的超越與昇華

在1980至1990年代，市場經濟對計劃經濟的取代使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產生巨大變化。這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來說都是個重大的分水嶺，對劉再復個人來說亦然。他的人生於此分為兩段，中間隔着大洋，這不僅包含余光中的「郵票」傳遞的鄉愁以及中西文化的衝突，更甚的是隔絕的生活本身——他看清了魯迅曾經刻畫的「鐵屋子」。所以，劉將此後稱為「第二人生」(頁13)。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成就了劉再復，為其人生境界的超越注入動力：「第一人生」充分顯示出他的文學才華，「第二人生」則譜寫了他的人生智慧，學問與生命互為表裏。

劉再復的「第一人生」是一個勵志故事。山區的孩子，七歲喪父，身為長子，早熟早慧，嘗盡人世冷暖；窮到冬天沒有鞋子；聞雞起舞，第一個到校，爭取考第一可以因此免學費。遍覽文學書籍，精神的飢餓使人暫時忘卻肉身的飢餓，文學灌溉着內心的詩意，詩人氣質在他身上安營扎寨。他的才華和努力得到了師長的賞識，使他能

吳小攀採訪撰寫的《走向人生深處》是一部時間跨度長、空間跨度大、堪稱「全球化」的訪談錄，展示了劉再復的文學觀、思想觀、人生觀，其中蘊含着一種誠實的心靈詰問。

夠從廈門大學畢業後被推薦到錢鍾書身邊工作，慢慢攀登文學的高峰，並走進1980年代的文學史。家國憂思、家國情懷這一寶貴的傳統中華文化情感同樣表現在劉身上，他像許多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份子一樣，將自己的命運與民族國家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站在一個闊大的精神平台上考察中國文化；敏銳、大氣而新穎的批評伴隨他成長。1980年代後期，他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

劉再復的「第二人生」從「大洋彼岸」開始。他不懂英語，不會開車；在美國，面對截然不同的文化習俗……「兩眼一抹黑」（頁15），「第一人生」裏的光環全部褪去，對他的「第二人生」似乎沒有任何幫助。漂泊在異國他鄉，是文學拯救了暗夜的他，是文學史上那些卓絕的心靈照耀着他，使他不致在孤單中消沉，也不致在回憶中迷失。此時的他有如《一千零一夜》中那個講故事的新娘，沒有精彩的故事就沒有明天；沒有精神探索，沒有文學對靈魂的支撐，也就沒有他的「第二人生」（頁42）。當「文學」與「活下去」如此切近地聯繫在一起時，文學深層的超越乃至拯救意義就凸現出來，使他可以淡然應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苦難。與此同時，這些苦難經歷反過來又激蕩並豐富了他的人生，昇華了他的文學觀。

「第二人生」讓劉再復淡出「中國文學」，走向「文學世界」；淡出具體的政治糾葛，走向高遠的社會

關懷；淡出現世的名利，走向廣大的慈悲。恰如「自性」是對「主體性」的揚棄，劉的「第二人生」是「第一人生」的擴大與昇華，復活與再生。

在1980年代，劉再復提倡文學的主體性有其具體的文化語境，為了將文學從「環境決定論」、「社會生活決定論」等被動的境遇中解放出來，為了促使文學與陳舊的意識形態和話語方式決裂，讓文學重新回歸「人」的懷抱，讓備受壓抑的人性和久遭踐踏的尊嚴得到張揚，他大聲疾呼建構文學的主體性。

關於人，康德的判斷——「人是目的王國的成員，不是工具王國的成員」——撞擊着劉再復的脊椎，使他以此立文，在〈論文學的主體性〉中，他指出：「文學主體包括三個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即：（1）作為創造主體的作家；（2）作為文學對象主體的人物形象；（3）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和批評家。」<sup>③</sup>這種論述在當時渴望解放的整體意識形態語境中猶如久旱甘霖，滋潤了無數乾涸的心田。劉認為文學要有「超越性」的意識由此埋下伏筆，隨後他寫下〈再論文學主體性〉一文<sup>④</sup>，對主體性的精神內涵進行更細緻、更系統的辨析。

文學主體性的提出主要來自改革開放時期對西方學術成果的吸納，但劉再復並未因此忘掉根深葉茂的民族傳統文化，對大乘佛教和禪宗的興趣使他將主體性擴大到一個更廣闊的範疇，提出文學的「自性」<sup>⑤</sup>，「主體性的對立項是客體性

劉再復將文學主體性擴大到一個更廣闊的範疇，提出文學的「自性」，是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回應和糾偏。由於漫長的文學史中文學的自主地位貧乏，以「文以載道」為標誌的「他性」對文學的純粹性、審美性有所腐蝕，使文學由目的降格為手段。

(對象性)；自性的對立項是他性。文學自性排除一切他性……」(頁202)「自性」在一定程度上對應了西方哲學的「主體間性」，是對主體性和客體性之間不息的互動作用的正視，也是對主體、客體二元對立的彌補。劉提出「自性」的概念，更是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回應和糾偏。由於漫長的文學史中文學的自主地位貧乏，以「文以載道」為標誌的「他性」對文學的純粹性、審美性有所腐蝕，使文學由目的降格為手段。劉認為偉大的文學不能被各種外部的、俗世的利害所牽絆，這就要求作家始終保持「檻外人」<sup>⑥</sup>的心態，保持天真、童心、赤子之心。

劉再復這樣要求文學，也這樣要求自身，「超越性」貫穿他的文學思想，要求他不斷超越各種具體的局限，讓靈魂每天生長，讓心靈在審美中不斷淨化。這決不是說劉不食人間煙火，不懂得現實習焉不察的薰染力量。恰恰相反，對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的觀察和思考讓他深深地體會到這種文化風暴般的裹挾性，個人在家、國、天下面前何其渺小，隨時可能像祥林嫂、孔乙己一樣被吞噬。正因如此，他要求文學對靈魂起作用：使人變得潔淨與強大，讓人能夠在黑暗、污濁和寒冷的現實人生之外構築起另一個詩意的世界，在單一重複的世俗生活面前建立豐富多元的心靈生活，讓人能夠穿越具體的時間和空間，去與人類那些最高尚最美好的心靈共鳴。現實的牆無所不在，心中的自由彌足珍貴。雞蛋碰牆、長矛指向風車的文學抱負因此值得大書特書。

## 二 心靈是文學批評的首要依據

劉再復的文學批評忠實於自己的文學觀，無論是對自己尊敬的胡繩、錢鍾書等長輩，還是對同輩和後輩，他都力圖保持客觀立場，依循自己的心靈準則。

比如對胡繩，劉再復在〈愛怨交集的往事〉一文中認為，胡繩「常常在黨性和人性之間掙扎」(頁169)。對胡繩的著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sup>⑦</sup>將中國近代史描述成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三大革命的單線歷史，劉予以批評並強調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維度，即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憲政等尋求改良的歷史圖景。他同意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學派對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外在因素所起的推動作用的肯定。他認為胡繩的立場實質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立場，「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以這種單一的眼光觀照中國近代史，就容易將之孤立地敘述成被統治階級推翻統治階級的歷史，即暴力革命的歷史，而忽視了整個世界現代性追求所帶來的日趨緊密而內在的聯繫(頁95)。

在劉再復看來，暴力革命只是歷史長河的節點，歷史的常態恰恰是生產力的發展史，所以，他在全球視野中用雙線史觀來考察中國複雜的現代轉型。從文學研究來說，對暴力革命的重視帶來的結果是宏大敘事的盛行，強調大的、宏偉的價值、集體的價值、精神的價值；而對生產力發展的重視恰恰凸顯日常生活的合法性、正當性，重視小

劉再復在全球視野中用雙線史觀來考察中國複雜的現代轉型。雙線史觀乃真正的內在的歷史辯證法，讓家國情懷與日常敘事並行，價值的多元豐富得以呈現。

對魯迅的評價往往也隱含着批評家對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和對中國現代性追求的立場。劉再復認為，夏志清雖然發掘了「被文學史活埋的幾個作家」，但同時又活埋了魯迅等親近革命的作家。

的價值、輕逸的價值，並正視肉身的價值。雙線史觀乃真正的內在的歷史辯證法，讓家國情懷與日常敘事並行，價值的多元豐富得以呈現。

又如對大學問家錢鍾書，劉再復既充分肯定其學問博大精深，認同李澤厚的評價「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同時也指出其「重博識」而不「重新知」的學術特點；而對他的小說《圍城》，劉巧妙地借他老師的觀點說錢的「主要成就是學問」而一筆帶過（頁66）。顯然他對《圍城》的藝術成就有所保留，小說中對人物的刻薄挖苦有悖「恕道」，賣弄知識廣博的敘事高調和對知識份子的精神矮化也有違於劉對作家「自審」和「懺悔」的要求。在劉那裏，如何正面、客觀地呈現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風貌和襟懷，依然是中國文學的重要任務。

劉再復和夏志清在魯迅的評價問題上存在較大的分歧，對魯迅的評價往往也隱含着批評家對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和對中國現代性追求的立場。夏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魯迅有諸多微辭，並對整個左翼作家群體和左翼革命文學都有所詬病<sup>⑧</sup>。夏的著作乃「他山之石」，對於中國文學史研究具有開風氣之先的重大作用。在劉看來，夏雖然發掘了「被文學史活埋的幾個作家」，高度肯定張愛玲、沈從文等與政治保持距離的作家的文學成就；但同時又活埋了魯迅、趙樹理、丁玲等親近革命的作家。這就不光是單純的文學問題，而是一個如何看待中國歷史的問題（頁157）。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隨政治鐘擺忽左忽右的書寫恰恰證明政治

對文學的深刻影響，證明建立文學「自性」的困難所在。敘事學、形式主義、新批評等諸多西方批評理論都試圖割裂文本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甚至割裂文本與作者的關係，將文本作為一個自足的世界讓人考察其純文學性，這種做法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有其革命性的作用，能解決文學的外部重負，但從全域來看，文本就像果實，不僅與樹（作者）分不開，也與樹林、氣候等（時代環境）密不可分。所以，針對具體的作品，我們還得聯繫作家的人生和創作的時代等因素綜合考察，才能獲得一幅全景圖。

劉再復在與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一書中，以「罪」作為關鍵詞全面檢討梳理中國現代文學<sup>⑨</sup>。對於魯迅的《狂人日記》，他們認為作家發現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一直犯着「吃人」的罪，但是這個罪惡的源頭不是基督教所謂的「原罪」，而是中國的男權文化、宗族文化。在這裏，「父親」成為審判的對象，因為「吃人」是緊隨着「父親」和「長兄」的；而「長兄」吃掉的是自己的「親妹妹」，所以「弟弟」（狂人）產生過激的反應<sup>⑩</sup>。在他們看來，中國第一篇現代白話文短篇小說是由魯迅書寫的，魯迅發現了中國社會結構深層的人倫罪惡，由此也衍生子君等女子「離家出走」的文化主題。男權文化沒有給離家出走的女子安排任何出路，她們要麼像子君、祥林嫂一樣死亡，要麼像繁漪一樣發瘋。個人主義四處碰壁，不光是女性，即便是孔乙己、魏連殳、閻土等男性，同樣身陷羅網無法動彈，每個人都在沉淪之中，內在生命被窒息。

依照劉再復和林崗的闡釋，魯迅用一個個具體的生命的毀滅和一連串精神性的死亡展示了中國封建文化內部的「罪」，這種內化的文化觀察和文學創作實踐持續時間不長，尚未來得及更加深入發展就被外化的革命潮流所湮沒。到了1920至1930年代，隨着國內革命形勢的變化，革命文學應運興起，劉在訪談中指出，「發現歷史罪人是阻擋歷史前進的反動階級——地主資本家階級，一切罪惡都來自這個『罪人』。這兩次歷史罪人的發現，形成現代文學和前期當代文學的基調」（頁156）。革命文學的這個發現使階級話語獲得了廣泛的共鳴，「群」的話語遮蓋了「個人」的話語，被統治階級的暴力行為得到了理論支持。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歷史為西方憎恨理論湧入中國以及「造反有理」等暴力激進行為提供了文化共鳴的基礎。因此，在劉和林看來，浩浩蕩蕩的文化大革命到來，並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某一位歷史人物的過錯，而是受西方外力推動的中國現代性追求與中國傳統文化毒瘤急劇碰撞交合結下的「罪」果<sup>①</sup>。

當我們把歷史之罪歸結為男權制度、宗法文化和反動階級的時候，我們就為洗刷自身和開脫自己的罪責提供了藉口；階級論尤甚，可謂文革中「身份論」登場之前奏，身份的宿命性成了中國式原罪。對此，我們始終不曾嚴肅地「自審」，對自身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以及自身之「罪」缺乏認識，對自己也是「吃人」者和幫兇缺乏警覺。在這種背景下，文學創作必然缺少

「自審意識和懺悔意識」，缺乏靈魂燭照。對此，劉再復懺悔說，「懺悔意識就是自己在無意中也進入共犯結構，在罪的構成中自己也有一份責任，也是一個共謀，這是對良知責任的一種體認。」（頁150）他在訪談中認為，懺悔意識只在《紅樓夢》和《狂人日記》等極少量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中存在。

劉再復認為缺乏罪感、懺悔意識，流於表面的控訴和外部的譴責，不能潛入到歷史文化的根部進行深層透視和反省，是中國主流文學的最大弊病。直到今天，對文革的反思、對整個中國近代史的反思大多停留在表層，控訴、洩憤、譴責成了很多廉價作品的創作動機。多數作家缺乏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執著，缺乏進入共犯結構的勇氣。不敢清理歷史，必將苟且於現實，被肉乎乎的欲望裹挾滑行。

劉再復的文學批評合情合理。我們祖先造詞時將「合情」擺在「合理」前面不是沒有道理的，所謂「好詩不過近人情」。在中國文化中，直覺對邏輯具有優先性，直覺是每個活生生的個體的反應，而邏輯需要借助中介，相對滯後。所以劉喜歡用「悟」的方法談論《紅樓夢》。中國人常講「將心比心」，許多事情的依循標準恰恰是符合心情的法度和心靈的法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既是人可以溝通、對話和談判的源頭，也是社會性的根基。而且心靈的法則是最純潔的法則，捫心自問是超越了一切俗世羈絆的最高法則。

劉再復在訪談中多次強調「回到脆弱的自己」（頁151），這個自

劉再復在訪談中多次強調「回到脆弱的自己」，「脆弱的自己」往往是最真實最內在的最柔軟的那一面，也是「自性」的棲居地。在談論文學觀時，他將「心靈」作為「第一要素」提出來，當代中國文學的匱乏也正在此。

劉再復認為《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堪稱「負典」，集中體現了「文化偽形」問題，《西遊記》倡揚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大勇氣、大智慧，《紅樓夢》則保存了「中國文化中最本真的一切」，是一部偉大的「心學」。

己當然不是指「皮囊」而是指「心」，不是「我」而是「自我」；「脆弱的自己」往往是最真實最內在最柔軟的那一面，也是「自性」的棲居地，是黑暗下面的光（頁202）。在談論文學觀時，他再次將「心靈」作為「第一要素」提出來，當代中國文學的匱乏也正正在此，我們應該重新將文學放在「心」上，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要隨時隨地檢校自己的心靈，「心外無物」；同理，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也要重倡心靈的依據（頁231）。

### 三 「文化偽形」與中國文化傳統的揚棄

受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一書提到的文化變形變質理論的影響<sup>②</sup>，劉再復發現中國文化的「偽形」問題，比如當漢代「獨尊儒術」之後，儒學不僅喪失了「百家爭鳴」的思想活力，而且儒家文化自身也慢慢走樣，導致後代諸多知識份子最渴慕「為王者師」，加入到統治集團中去分享現實利益，以至喪失了知識份子的獨立性、自主性，甚至為虎作倀、幫忙幫閒。

劉再復認為，「四大名著」中，《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堪稱為「負典」，集中體現了「文化偽形」（頁184）問題，這種偽形既表現在文學生產中，也表現在幾百年歷久不衰的文學傳播中。這兩部小說能成為名著是由於偽形的儒家文化的支持，得到了廣大讀者、點評家的心理認同。作家的敘事技巧愈高，偽

裝愈巧妙，對讀者的侵害就愈深，也愈不易覺悟。「雙典」流傳之廣泛、在當代被改編的藝術形式之多，都足以說明「雙典」持續、深遠和廣泛的影響力。

劉再復對《三國演義》中「義」的變質與權術崇拜、《水滸傳》中「替天行道」遮掩的暴力崇拜作了激烈的批判，他認為今天厚黑學的盛行、缺乏誠信都可以從這兩本「負典」中找到精神源頭。在今天看來，《三國演義》中「義」的倫理阻礙着現代國家的法制建設，兄弟義氣、江湖習氣影響着政治場的裙帶關係和學術場的師生關係；而《水滸傳》的廣為傳播使「造反有理」大行其道，很多人並沒有清晰的政治理念，為造反而造反，或為報一己之怨而造反，這都會給社會帶來極大的危害。

事實上，由於文化消費主義的快速興起，暴力和權術以及其變種正在遍布中國當代文學敘事。從1990年代一度盛行的「官場小說」、「反腐敗小說」中可以看到權術、宮闈的黑色幽靈在四處飄蕩；暴力血腥崇拜橫行於中國當代文學想像中。權術和暴力不僅遍布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過多的虛無、冷漠和暴力也瀰漫在中國作家的敘事世界；電視劇痴迷的後宮戲中尤甚。影視的票房、收視率頗能折射一個時代大眾流行的趣味。光明、溫暖和自由在現實和文學中都變得非常稀薄。此時，甄辨文化傳統的優劣利弊，對文學經典作客觀解讀別具現實情懷。

劉再復認為「四大名著」中，《西遊記》倡揚了中國古代神話女媧

補天、精衛填海、后羿射日中「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大勇氣、大智慧，這種勇氣與智慧隨着傳統文化的偽形，正在喪失殆盡，就是在這種貧瘠衰敗的思想基礎上犬儒主義大行其道，大家得過且過，不問蒼生、更不問民族未來。

劉再復認為《紅樓夢》則保存了「中國文化中最本真的一切」，是一部偉大的「心學」（頁183）。既為心學，則需要讀者用心來閱讀，用心來領會，用心去體驗作者的心情，去交換人物的心理，所謂「心之官則思」。劉以「悟」來讀，「悟」為會意字，左「心」右「吾」，換句話說，就是以讀者自己的心，尊重心靈的優先性、獨特性、情感性。

「四大名著」經典地位的確立與二十世紀現代性追求過程中小說擔負的功能相關。二十世紀初，梁啟超將小說提到「新民」的高度。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興起於十八世紀的歐洲的想像形式——小說與報紙——為「重現」民族這種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技術上的手段，因為小說以「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表現同時性的設計，這種同時性恰與民族想像同源<sup>③</sup>。二十世紀上半葉，文學的現代性追求與民族國家的建構同步，尤其是傳統的家國情懷得以現代轉化，小說在凝聚民族想像、激蕩民族感情、喚醒共同體的信念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離開這種「啟蒙壓倒救亡」的語境之後，「四大名著」的功過是非應該重新釐清，對其文學技巧和傳播文化功能應該分開來談論。對中國悠久的古典文化同樣需要仔細辨析，

不能一靠上傳統的肩膀就具有天然的優越感，如魯迅對「二十四孝」的批判這樣的工作還需要繼續。

劉再復非常重視文學的「接受」功能，在他列舉最鍾愛的十本名著中，只有《紅樓夢》是唯一的一本中國書籍，其他全為西方著作（頁123）。這與當年魯迅提倡大家不看中國書有某種精神默契。他們都看到了中國文化積習的最深處，看到了近代中國步履維艱背後沉重的思想包袱。文化和國家互為表裏，互相催化。力主閱讀西方書籍背後並非不愛國，更不是不愛中國文化，而是希望以民主法制替代明君恩典，以現代普世價值更新民族精神、改造文化傳統，讓東方文化博採眾長，催發新生。

劉再復和林崗認為，西方文化的「原罪」意識使作家在敘述此岸世界時總能以神的神性對之加以關照，提出比天子、君主更高的神性維度，所以說「(俄狄浦斯王)失明的眼睛最漂亮」。正是因為始終以神性來觀照，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能寫出「靈魂的深」，寫出「罪惡」下面的「潔白」<sup>④</sup>。麥克白在弑君之後良心不安，風吹草動都讓他無比恐懼，沙翁的戲劇詳盡地展示了這種靈魂最裏邊的掙扎，人心的法庭無處不在。西方偉大的文學能細緻入微地表達「自性」的高貴、內心的複雜、世俗欲望與超越理想之間的張力，而中國文化由於缺乏神性這一維度，缺乏更高的超越性的參照體系，往往停留於現世的罪惡，表現犯罪與肉身的懲罰，未能有效地展示主體內心法庭的風暴、「靈魂的對話和論辯」（頁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長時間被革命倫理裹挾，充滿暴力傾向的階級話語佔支配地位，影響文學從更高更深處審視人生，表達靈魂的高貴與豐盈。基於這種內在的簡單和貧乏，劉再復提出文學應該要有「超越」視角。



無論是「第一人生」還是「第二人生」，人生與文學在劉再復身上始終合二為一。理解劉再復也是重新理解新時期文化（文學）批評和學人情懷的一種努力。

151)，所以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趨向扁平單一，敘事面貌被善惡報應等外在衝突主宰，「大團圓」這種廉價的安慰一直在左右我們的情感結構，促使我們與外部世界和解。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長時間被革命倫理裹挾，充滿暴力傾向的階級話語佔支配地位，影響文學從更高更深處審視人生，表達靈魂的高貴與豐盈。基於這種內在的簡單和貧乏，劉再復提出文學應該要有「超越」視角<sup>⑮</sup>，超越個體利害、超越現世乃至超越狹隘的民族立場，站到更高處，讓內心擁有光源、溫暖和愛，寬恕世間的一切，才得以正視文學的精神重量。

#### 四 小結

無論是「第一人生」還是「第二人生」，人生與文學在劉再復身上始終合二為一。他的文學是浸潤在人生中的文學，他的人生也是浸潤在文學中的人生。理解劉再復也是重新理解新時期文化（文學）批評和學人情懷的一種努力。去國之後，劉受到西方文化真切的刺激和洗禮，地域上的距離讓他以更廣博的視野、更地道的中國話語批評中國文學經典，並對中國傳統文化條分縷析，對儒家文化偽形問題作出鞭辟入裏的分析。這是一種深沉的人文情懷，是遊子對母親的獻禮，也是對中國如何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精髓的偉大構想。

持續一個多世紀的中西古今之爭在經濟中國崛起之際愈演愈烈，仁人志士都在探求建構中國現代文化的出路。在大談民族文化偉大復

興的歷史時刻，在復古的音調隨着物質欲望的刺激愈來愈高亢的時候，重溫「歸去來兮」的劉再復的人生與思考，具有更深切的當下意義。

#### 註釋

- ①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6）。
- ② 吳小攀：〈用八年時間與劉再復「談」出一本書〉，《南方日報》，2011年4月17日，第12版。
- ③ 劉再復：〈論文學的主體性〉，《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頁15。
- ④ 劉再復：〈再論文學主體性〉，載沈志佳編：《文學十八題：劉再復文學評論精選集》（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頁442。
- ⑤ 劉再復：〈文學自性的毀滅與再生〉，載《文學十八題》，頁371。
- ⑥ 劉再復著，林崗編：《人文十三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頁439。
- ⑦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⑧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 ⑨⑩ 劉再復、林崗：《罪與文學》（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 ⑪ 林崗：《醉論風雨六十年：三醉人對話錄》（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頁58-59。
- ⑫ 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著，齊世榮等譯：《西方的沒落》（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330。
- ⑬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23。
- ⑭⑮ 劉再復、林崗：《罪與文學》，頁235；89。

申霞艷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